

从公开信到教会条例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的
信息网络构建及深化践行*

From Open Letters to Church Ordina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by Martin Luther During the Reformation

周施廷

CHOW Szeting

作者简介

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OW Sze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chow@ruc.edu.cn

Abstract

Letters were the primary means to convey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eformation, while open letters were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Martin Luther and the German people. As the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Luther's correspondence involved citizens, cities, and local princes. His letters provided spiritual comfort and doctrinal guidance to the public and promoted social reform and church visitation in Protestant cities and reg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printing press, Luther's exchange of letters with the people led to a rapid expansion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His works began to be published in southern German cities. Some of these areas enacted church ordinances to consolidate the reform after conversion. From open letters to church ordinances, Martin Luther based his own writings on the public opinion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intensifying and sustaining the religious movement in Germany.

Keywords: Martin Luther, open letters, church ordinances, Reform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德意志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宗教领域的神学争辩是如何转向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的？“转向”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运动的发展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是改革范围的扩大，宗教改革嵌入到民众改革之中，成为人民参与的社会运动。在传播意义上，是建立了便捷有效的信息沟通网络，马丁·路德等新教领袖得以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对话。在公共意义上，则是指新教的改革诉求与民众的改制意向形成互动，最后在政策和法律方面建立起新的教会体制。

在上述的转向中，第三种意义最具有争议。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杰拉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教授认为新教的信息传播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在新教教义中找不到任何有利于生存的价值，因为新教教义没有将训诫与普通人的实际需要和意愿结合起来。”^①与此不同的是，美国俄勒冈大学托马斯·A·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教授表示，人们愿意聆听福音派领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人们关心已久的问题给出了答案。^②新教改革家与民众的信息交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通信的方式传递的。与出版和布道相比，书信不仅具有传递速度快，信息含量高，传播距离远等优点，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信息准确无误地输送到收信人手中。根据信件的内容，可以判断改革家嵌入社会生活的程度。这里的问题是，宗教改革家与人民沟通的内容是什么？路德在与社会人士通信时，他是在引领改革运动，还是在与民众交流互动？他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236）的阶段性成果。[This essay is a result of Major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o: 19ZDA236).]

^① 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307.

^②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3.

是纯然的解释教义，还是突破了宗教的局限，更加深入地关注到了社会问题？最后，我们能否根据信息网络延伸的状况，来判断宗教改革的范围，尤其是运动的广度和深度？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魏玛版路德书信集》^①和《16世纪新教教会条例》^②为基本史料，并辅以“通用短标题目录”（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③收录的德意志地区出版物数据加以分析，探讨1521年至1533年的信息网络发展状况，确定运动涉及的范围和程度，以及说明上述“转向”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与此同时，本文也将考察路德是如何以“公开信”这一特殊的沟通渠道，在为人民提供精神慰藉和教义指导的同时，引领新教城市和地区开展社会改革和条例修订，从而将宗教争辩转变成为一场顾及人民福祉的社会改革运动的。

一、“公开信”与信息网络的构建

宗教改革“转向”的意义，一是要看路德与民众之间是否形成互动，改革的内容是否因此有所变化；二是要看是否形成了新教领袖与民众之间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以此确定改革的范围的扩展程度。

致市民的“公开信”，是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传递信息的主要手

^① 书信是16世纪的信息传播载体，路德从1501年便开始与欧洲大陆各地的人物通信，现存的书信总量达到2580封之多。《魏玛版马丁·路德书信集》（*D. Martin Luthers Werke: Briefwechsel*）收录路德从1501年至1546年间的往来书信，路德在写信时会按照通信对象的情况而选择使用德文或拉丁文。本文中路德写给维滕贝格市民和什切青等市政府的“公开信”均以德文写成，从语言的选择，可以看到路德是有意识地增加信息在民众间的普及和传播。以下《魏玛版路德书信集》缩写为：WA Br. 卷数，页码，《魏玛版路德文集》缩写为：WA 卷数，页码。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Böhlau, 1883-2009).

^② 《16世纪新教教会条例》由海德堡大学历史学系的埃米尔·赛林（Emil Sehling）教授从1902年开始编撰，随后历经多位主编，最后在2017年完成。全集收录了所有德意志新教地区颁发的城市条例和法令，是研究新教城市改革最关键的史料之一。*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I-XXIV*, eds. Emil Sehling and Eike Wolgast (Leipzig: O.R. Reiland, 1902-2017).

^③ 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www.ustc.ac.uk> (accessed April 20, 2022).

段。从1517年路德张贴反对买卖赎罪卷的《九十五条论纲》起至1521年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改革运动是一个不断向上的发展过程。但是从1521年1月之后，形势出现逆转。先是罗马教廷宣布绝罚路德，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Karl V）颁布在全国通缉路德的敕令。^①参加完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后，路德在返回维滕贝格途中遭遇蒙面人绑架，实际上后者是按照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iedrich der Weise）的指令要把路德护送到瓦特堡藏匿起来加以保护。^②在瓦特堡，路德开始用近代早期高地德语（Frühneuhochdeutsche）翻译新约圣经。^③在此期间，路德无法与任何人会面，这也就意味着从1521年5月至1522年3月，是他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的十个月。

为了推动改革的持续发展和摆脱被动的局面，路德开始寻求传递信息的渠道，他首先是给支持他的市民群众写信。与一般信件不同的是，路德写给市民的公开信更加注重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关注民众的需求。他早期的信件大部分是私人信件，但随着运动的深化和声誉的提高，部分信件从私人信件转变为公共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版和流传。路德撰写“公开信”有两个目的，一是与广大民众建立直接联系；二是声援和安慰遭遇危难的改革支持者。《致维滕贝格基督徒的公开信》（1521年6月）是路德写给人民的第一封“公开信”，这是为了安慰误以为路德去世的维滕贝格民众而特意撰写的信件。^④书信的性质非常特殊，因为在写信的时候，路德已经知道信件会在短时间内被公开，甚至会印成出版物在维滕贝格市民手和中传播和讨论。路德在信

^① Melanie Möger, *Reichstage und Reformation: Der Wormser Reichstag 1521* (München: Grin Verlag, 2010), 6.

^② Lyndal Roper, *Martin Luther: Renegade and Prophet*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6), 195-216.

^③ 近代早期高地德语主要在1350-1650年使用，在一些诸侯领地和帝国城市是官方的书面语言。Thordis Hennings, *Einführung in das Mittelhochdeutsche* (Berlin: De Gruyter GmbH, 2012), 16-17.

^④ WA Br. 2, 353; WA 8, 205-209.

件中明确表示出希望与民众沟通的意愿。为了阐明立场，他把自己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描写的非常详细，叙述了多场辩论的经过以及天主教神学家对他的指责。路德还告诉人民他要翻译一部德语圣经，并随信附上刚翻译好的《诗篇》第37章作为送给维滕贝格市民的礼物。^①

路德的公开信让所有读者都受到了强烈的鼓舞，因为这封信回答了民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路德是否安全；二是他抨击罗马教廷的立场是否坚定。随后，路德在11月1日又撰写了《致维滕贝格奥古斯丁修士公开信》，原因是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在维滕贝格带领一批奥古斯丁修士拒绝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弥撒，藏身于瓦特堡的路德决定向市民们传递他的看法。^②此时路德对信件“公开性”已有一定了解，认识到书信在“用途”和“影响”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③在信中，路德附上了关于弥撒的指导性文章，同时亲自准备了拉丁文和德文两个版本，加上标题《马丁路德对废止私人弥撒的裁决》。这封书信共有四个版本，两个拉丁文和德文的“文章版”和两个拉丁文和德文的“书信版”，出版和署名时间各不相同。最早出现的是“拉丁文书信版”，信中的署名时间是1521年11月1日，^④随后“拉丁文文章版”在11月11日出版。^⑤“德文文章版”取名为《关于弥撒的滥用》，在1522年1月出版，“德文书信版”出现的时间最晚，署名于1522年11月25日。^⑥

从这时候开始，路德的公开信具有“书文结合”的特点。他的文

^① WA 8, 213.

^② 卡尔施塔特在1521年11月发表《对誓言的指导》（*Von Gelübden Unterrichtung*），在文中他否定了修士独身制和修道誓言、圣徒礼拜和圣徒的图像。Stephen E. Buckwalter, *Die Priesterehe in 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 Haus, 1998), 92; Thomas Kaufmann, *Der Anfang der Reformation: Studien zur Kontextualität der Theolog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2), 85-86.

^③ WA Br. 2, 399-400.

^④ WA 8, 407.

^⑤ WA 8, 411-481; WA 8, 482-563.

^⑥ WA 8, 408.

章会作为书信的附件一并寄给民众阅读。信件在维滕贝格出版后，拉丁文版随即于1522年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维也纳三个地区出版，德文版152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但封面上写的出版地是维滕贝格，可见奥格斯堡使用的是维滕贝格的底板。^①这是路德作品常见的情况，即第一个正式版由维滕贝格的印刷商出版，然后再在纽伦堡、奥格斯堡和马格德堡等城市出版。路德也有固定的合作印刷商，以保证作品的印刷质量。作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路德深知维滕贝格市民的困惑所在：人们不知道在脱离教廷管辖后该如何进行宗教活动，所以路德就一些重要教义问题向人民提供指导，他把对弥撒仪式的理解借助书信传递给民众，完成将个体知识转化公共知识的过程。^②

在构建路德与民众的信息网络方面，继1521年的“公开信”后，通过写信向各地民众传递信息成为常态，通信网络也随之不断扩大。这类“公开信”通常以“致某地的基督徒”为名，内容是关于信仰方面的指导，收到过信件的城市包括多尔帕特、塔林、里加、沃尔姆斯、奥格斯堡、米尔滕贝尔格、利沃尼亚、不莱梅、安特卫普、埃尔福特、哈勒等地。^③在信件数量方面，路德在1521至1533年期间与其他人的往来信件共有1774封，平均每年的信件数量在一百四十多封，同时他写信的对象数量也从1521年开始不断增加，从每年20至30位，增加到最高峰时期的60多位，可见他的通信网络颇具规模（见图一）：

^① Hans-Joachim Köhler, *Bibliographie der Flugschriften des 16. Jahrhunderts, Teil 1: Das frühe 16. Jahrhundert (1501-1530), Bd. 2, Druckbeschreibungen H-L* (Tübingen: Bibliotheca Academica, 1996), 613.

^② Andrew Pettegree, *The Invention of News: How the World Came to Know about Itself*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8.

^③ WA Br. 3, 118, 138, 202, 245, 336, 354, 448, 468; WA Br. 4, 146, 256, 444.



图一 马丁·路德的主要通信人物网络（1521-1533年）^①

路德的通信对象包括德皇、英格兰国王和丹麦国王，历任的萨克森选帝侯和红衣主教，也有各地的教士、市民和市政府。与路德互通信件最多的十位对象是：乔治·施帕拉丁（George Spalatin，255封）、萨克森选帝侯约翰（Kurfürst Johann von Sachsen，173封）、尼古劳斯·豪泽曼（Nikolaus Hausmann，98封）、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thon，78封）、尼古劳斯·阿姆施多夫（Nikolaus Amsdorf，65封）、尤斯图斯·约纳斯（Justus Jonas，56封）、文策斯劳斯·林克（Wenzeslaus Link，55封）、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Kurfürst Johann Friedrich von Sachsen，35封）、阿格里科拉（Agricola，34封）和尼古劳斯·格贝尔（Nikolaus Gerbel，25封）^②

值得重视的是，路德信件的广泛传播，得益于近代早期德意志邮政系统的发展。欧洲的邮政系统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当时的外交使臣需要每周定期向威尼斯和罗马等地汇报情况，开始在固定的地点建立起一些有马匹和骑手的驿站，保证信息可不分昼夜地

^① 图中连接线条的粗细代表信件的数量，信件和人物数据来自《魏玛版路德书信集》。WA Br. 2-6.

^② WA Br. 2-6.

顺利传递出去。^①从16世纪初期开始,塔西斯家族(Taxis)控制了德意志邮政系统。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在位期间,由于统治的范围较大,他希望建立一个专业的信息传递网络,于是塔西斯家族便开始为他效劳。弗朗茨·冯·塔西斯(Franz von Taxis)曾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在1505年和1516年两度签订合约,在1516年的合约中,他更是获得了德意志所有邮政路线和交易的垄断权。虽然不时会出现延误、遗失和破损的情况,但16世纪德意志的邮政派送时间基本稳定,而且帝国邮政系统也对所有平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付费使用。^②塔西斯家族的邮政网络遍及欧洲大陆,从安特卫普送往罗马的派送时间仅为252个小时。就邮资而言,27封从布鲁塞尔寄往奥格斯堡的信件费用为8个里弗(livres),大约是3-4个基尔德(gulden)。^③

就影响而言,路德写给市民的私人信件,被印制成出版物在各地广泛出版,说明路德的观点是得到德意志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接纳的。由于路德的观点成为“公共知识”,以文本为载体,高速在德意志四处传播,也导致了运动的不可逆转性和信息流动的复杂性。从16世纪二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宗教改革家们逐渐认识到掌握话语权和建构信息网络的重要性。美国学者艾米·纳尔逊·伯内特(Amy Nelson Burnett)指出,维滕贝格、苏黎世、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改革家们

^① Rachel Midura, "Publishing the Baroque Post: The Postal Itinerary and the Mailbag Novel," in *The Renaissance of Letters: Knowledge and Community in Italy, 1300-1650*, eds. Paula Findlen and Suzanne Sutherland (London: Routledge, 2020), 256-262.

^② Mark Greengras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Europe*, eds. C. Scott Dixon and Beat Kümin (London: Routledge, 2019), 171; Veit Didczuneit, "Postgeschichte," in *Handbuch Brief: Von der Frühen Neuzeit bis zur Gegenwart*, ed. Marie Isabel Matthews-Schlinzig et al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0), 164-165.

^③ E. John B. Allen, *Post and Courier Service in the Diplomacy of Early Modern Europ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2), 9; Oswald Bauer, *Zeitungen vor der Zeitung: Die Fuggerzeitungen (1568-1605) und das frühmoderne Nachrichtensystem* (Oldenbourg: Akademie Verlag, 2011), 44; Andrew Pettegree, *The Invention of News: How the World Came to Know about Itself*, 169.

一直密切关注着对手的出版物，德意志南部的出版中心在维护新教信息的流行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①路德作品的出版和后续事态的发展，印证了在他的理性引导下，民众逐渐走上正确的改革道路。这样一种“直接又间接”的互动，使得路德与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也正是拯救宗教改革运动于危难的关键所在。

路德的信件数量和通信对象，说明信息网络的存在和新教改革内容的变化。第一，在16世纪早期，路德与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沟通渠道。第二，就通信的内容看，出现了路德改革的新特点。形式上，路德通过信件继续指导和引领改革，呼吁民众积极支援其改革事业，反抗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发展上，路德把宗教改革深化为社会改革，要求以和平的方式改变整个落后的教会体系。第三，路德在改革运动里增加了人民感兴趣的社会内容，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路德的写作对象并不限于贵族和僧侣，而是涵盖了所有普通民众。

二、政策层面的深化：路德致市政府的“公开信”

1522年3月至1524年，路德的写信对象从民众发展为城市政治组织，他所面对的问题多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具体事务。这时候，路德已经能够在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内自由活动，但由于通缉者的身份，路德在各地的逗留时间有限，通信仍然是他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手段。路德在这一年开始收到各地市政府的来信，第一个以城市市政府（Rat）身份向路德寻求建议的是阿尔滕堡，随后其他市政府也纷纷向路德写信求助。^②从1522至1533年，路德与市政府的往来信件共有

^① 德意志南部地区生产的印刷品可以沿着连接这些城市的主要贸易路线传播，而其他地区出版的作品可能很难在本地之外的区域流通。Amy Nelson Burnett, *Debating the Sacraments: Prints and Authority in the Early Re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

^② WA Br. 2, 502-503.

99封，涉及37个城市，这些城市包括：采尔布斯特（15封）^①、纽伦堡（9封）^②、阿尔腾堡（7封）^③、茨维考（6封）^④。

在各地新教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城市主要有三个急需解决的难题。首先，是否应当向神职人员征税，这涉及教会和世俗政府的权力分割问题。其次，如何没收教会财产，并由世俗的政府来管理和分配，这涉及建立用来救济穷人和病人的“公益金”（*Gemeinen Kasten*）制度。^⑤第三是婚姻改革，婚姻关系和婚姻生活向来是在天主教会的掌握之中，随着改革的深入，市政府要决定如何处理市民的婚姻案件。纽伦堡在1523年率先成为德意志第一个新教城市后，^⑥其他具有新教倾向的城市也纷纷开始思考改革的问题。有些城市写信给纽伦堡市政府咨询改革的经验，一些城市如什切青^⑦和莱斯尼希^⑧会直接给路德写信，询问他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路德的做法是，他会针对特殊问题和特殊处境予以回复，然后从个别走向普遍，最后由各地市政府在政策层面上落实改革方针。路德观点的公共性由此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以城市为共同体的空间内付诸实践并有效运行。

1523年1月11日，路德写了一封《致什切青市政委员会的信》。^⑨什切青城的市政委员会和教士们在教士免税问题上出现分歧，曾写信

^① WA Br. 3, 181-182, 197-198, 355, 492-496; WA Br. 3, 161, 291-292, 298-299, 301-302, 320-321, 346-347, 377, 576, 583; WA Br. 5, 16.

^② WA Br. 3, 413-414, 577-579; WA Br. 5, 335-337, 338-342, 446-448, 453-456, 518-521, 527-530, 542-543.

^③ WA Br. 2, 502-503, 504-505, 517-519, 522-523, 538-539, 540-541; 615-616.

^④ WA Br. 3, 178-179; WA Br. 5, 31, 693-694; WA Br. 5, 45-47, 62-66; WA Br. 6, 287-288.

^⑤ WA 12, 1-30.

^⑥ 纽伦堡在1525年3月3日至14日举行纽伦堡宗教会谈（*Nürnberger Religionsgespräch*），会议结束后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个新教城市，并在路德的思想指导下展开改革。Günter Vogler, *Nürnberg, 1524-152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tadt*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2), 46-63.

^⑦ WA Br. 3, 12-14.

^⑧ WA Br. 3, 23-24.

^⑨ WA Br. 3, 12-14.

请求路德的意见。路德的答复是，他认为不应该给予教士任何特权，教士也要缴税，这样他们可以分担社区的经济压力。^①路德坚持神职人员必须纳税是为了筹集足够的款项来帮助穷人或者兴办教育。德国明斯特大学的马丁·布莱希特（Martin Brecht）教授指出：路德要求教士纳税的观点，是他“两个王国”理论的展现。他要把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分开，地上王国的事务应该交由世俗权威如什切青市政委员会处理。^②什切青市政府在路德的帮助下，于1522年至1523年间在城市里推行了宗教改革，^③最终于1534年正式转信新教。^④次年，该城颁布《1535年什切青第一份新教教会巡视条例》，而路德关于“公益金”制度的观点，则是在与莱斯尼希市政府的通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在信中提及的改革想法，也一一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落实。^⑤

早在1519年，莱斯尼希市政府便有推动宗教改革的倾向。莱斯尼希教区神父海因里希·金特（Heinrich Kind）倾向于新教，提出由教区自行任命神职人员和传教士，以及在教区内设立济贫的“公益金”的想法，但遭到其他人反对。^⑥市政府派遣两位代表携带信件和草拟的《改革条例》，前往维滕贝格征求路德的意见。^⑦代表们到达后向路德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希望路德能够写一封许可书，让金

^① WA Br. 3, 12.

^② Martin Brecht, *Martin Luther: Zweite Band Ordnung und Abgrenzung der Reformation, 1521-1532*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86), 122.

^③ Wilhelm Heinrich Meyer, *Stettin in alter und neuer Zeit* (Stettin: F. Hessenland, 1887), 195-198.

^④ Eberhard Völker, *Die Reformation in Stettin* (Köln: Böhlau, 2003), 3-4.

这份条例的内容包含许多如公益金，建立学校，慈善救济等路德提倡的社会改革内容。“Abschied der ersten evangelischen Kirchenvisitation zu Stettin anno 1535,”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IV*, 523-529.

^⑥ Walther I. Brandt, “Introduction,” in *Luther’s Works, vol. 45*, ed. Walther I. Brand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2), 163-164.

^⑦ Carter Lindberg,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Social Welfare: Luther’s Influence at Leisnig,” *The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7 (1987): 89-90; Andreas Karlstadt, *Die Wittenberger und Leisniger Kastenordnung, 1522, 1523* (Bonn: A. Marcus und E. Weber, 1907), 24.

特继续担任教区神父；二是期望路德能够帮助修改和完善《改革条例》。^①路德在1523年1月29日的《致莱斯尼希政府》的回信中，高度评价莱斯尼希的《改革条例》和建立公益金的做法，并表示自己会满足他们的请求，在两件事情上向他们提供帮助，一是按照圣经组织教士的工作，二是准备一份关于唱圣诗，祷告和阅读圣经的条例。^②当年春天，路德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基督徒会众或社区的权利和权力来处置所有教导和呼召，任命和解聘教师》^③和《关于会众任命神圣礼拜》^④，为城市当局提供宗教事务方面的指导。

莱斯尼希市政府在接到路德回信后马上着手推进改革工作，建立公益金制度和实践教会改造计划。在2月24日，选出10位代表管理公益金；在3月8日，取消弥撒中的献纳，这意味着废除部分神职人员的工作。^⑤到了1523年8月，路德再次造访莱斯尼希，发现市政府并没有把钱投入到公益金，于是他在8月11日写信给选帝侯智者腓特烈，要求他批准莱斯尼希的条例。^⑥1523年下半年，路德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公益金条例》。^⑦路德与莱斯尼希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德意志城市新教福利制度改革的起点，他在关键时刻给予的指导，直接支援了市民们在城市里推动的制度化改革。

从上述例子可见，路德通过给市政府写信，阐明宗教改革在政策上的主要宗旨之一是解决穷人生活困难的具体问题。他的做法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宗教改革也逐渐转变成为“社区宗教改革”

^① Walther I. Brandt, "Introduction," 165.

^② WA Br. 3, 23-24.

^③ WA 11, 408-416.

^④ WA 12, 35-67.

^⑤ Walther I. Brandt, "Introduction," 165-166.

^⑥ Eduard von Mildestein, *Chronik der Stadt Leisnig: Handbuch d. Geschichte* (Leisnig: Bethke, 1857), 89-90; WA Br. 3, 124-126.

^⑦ Martin Brecht, *Martin Luther: Ordnung und Abgrenzung der Reformation 1521-1532*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GmbH, 1983), 47.

(Gemeindereformation)。剑桥大学宗教改革研究专家罗伯特·W·斯克里布纳 (Robert W. Scribner) 更是将城市改革称为“市政府的宗教改革” (Ratsreformation)，认为市政府对事态的变化相当敏感，但行事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市政府“对于新的想法，在尚未得到大部分人民支持之前，就已经作出回应。”^①这样一来，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路德写信给各地市政府，有助于在具体问题上形成共识，从而维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他还积极参与各地改革纲领和教会条例的制订，及时纠正不规范的宗教活动。路德的言论也从一家之言，发展为城市政治组织普遍接纳的政策性建议，从而将宗教改革与德意志民众的关系建立在维护民生福祉的前提和基础上，让运动在更广阔范围内得到承认和接受，进而得到实践和推广。

三、政策的制度化：路德与地区《新教教会条例》

在宗教改革深入发展后，各新教地区将制定教会条例提上了日程。路德认为应该借用诸侯和市政府的权威，在分散的改革局面中促成统一的地方制度。此时，路德的写信对象再一次出现变化，从民众、城市到地方诸侯，他希望能够保障改革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也要维护各地统治阶级的领导地位，因此，路德于1532年8月1日回复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伯爵和纽伦堡市政府的信件具有重大意义。^②事情起因是，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伯爵虔诚者乔治 (Georg der Fromme) 和纽伦堡联合起草了一份新的教会条例，他们把这份条例在1532年7月17日寄往维滕贝格，征求路德的意见，而这封信就是路德对他们的回复。纽伦堡是德意志第一个新教城市，在1525年便已经

^① Robert W. Scribner, "The Reform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Stadtbürgertum und Adel in der Reformation Studien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ed. Wolfgang J. Momms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56.

^② WA Br. 6, 338-342.

宣布信仰新教，^①勃兰登堡·阿斯巴赫伯爵的领地与纽伦堡相连，位于它的西南部。^②两个地区联合撰写和出版的《1533年勃兰登堡和纽伦堡教会条例》^③，被视为“第一份德意志新教教会条例”。^④

从改革的目标来看，虔诚者约翰和纽伦堡市政府都希望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将教会组织纳入地方的市政管理体制，使之更有效地服务于本地人员。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也早已发觉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在1524年让施帕拉丁咨询路德的意见，由于随后爆发了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导致教会巡视问题一直拖延到1527年9月，最后由梅兰希通完成初稿，路德加上前言后在1528年出版，名称为《萨克森选帝侯领地上对教士的巡视指导》（后简称《萨克森巡视条例》）。^⑤由于两人经常沟通看法，一般认为这是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⑥

《萨克森巡视条例》出版后，在德意志范围内影响巨大，除了1528年的维滕贝格初版，同年还在奥格斯堡、茨维考、埃尔福特、马

^① 纽伦堡在1525年进行新教改革后，意识到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仰同盟，在看到城市西边的勃兰登堡·阿斯巴赫伯爵虔诚者乔治也是路德的支持者之后，双方的关系在1528年后有所好转，最后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和虔诚者乔治决定进行正式合作，在两块相邻的领土上建立一套统一的本地教会体系。这个新教联盟的出现在16世纪的德意志开启了城市和领地政府合作的先例，引发其他新教城市的效法浪潮，他们开始颁布各自的城市教会条例，这些条例以“巡视条例”（*Ordnung der Visitatoren*）或“教会条例”（*Kirchenordnungen*）为名。Dieter J. Weiss, *Die Bistümer der Kirchenprovinz Mainz: Das exemte Bistum Bamberg 3: Die Bischofsreihe von 1522 bis 169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126-128.

^② C. Scott Dixon, *The Reformation and Rural Society: The Parishes of Brandenburg-Ansb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sanne Kleinoder-Strobel, *Die Verfolgung von Zauberei und Hexerei in den fränkischen Markgrafentümern im 16. Jahrhunder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49-51.

^③ Markgrafschaft Brandenburg und Freie Reichsstadt Nürnberg in Zusammenarbeit, “Kirchenordnung in meiner gnedigen Herrn der Marggraven zu Brandenburg und eins erbern Rats der stat Nürnberg oberkeyt und gepieten,”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XI*, 140-205.

^④ Susanne Kleinoder-Strobel, *Die Verfolgung von Zauberei und Hexerei in den fränkischen Markgrafentümern im 16. Jahrhundert*, 46.

^⑤ WA 26, 175-240.

^⑥ Jörg Haustein, *Philipp Melancthon: ein Wegbereiter für die Ökume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17-18.

尔堡和纽伦堡出版。在看到维滕贝格成功展开教会巡视后，勃兰登堡和纽伦堡也产生了巡视的意愿。因为这份巡视指导同时在六个城市出版，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它作为参考材料，虔诚者乔治在神学家的帮助下也获得了一份《萨克森巡视条例》，^①并就合作问题与纽伦堡于1528年6月14日在施瓦巴赫进行会谈，^②围绕神学家安德利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草拟的23条例展开讨论，^③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1528年教会条例》。^④由于条例在神学意义上不够深刻，也缺乏法律层面的辨析，所以双方最后都没有采纳这个版本。然后，纽伦堡又组织了一批神学家重新讨论和改写，终于在1530年完成草稿。^⑤1531年年底，安斯巴赫市政府和纽伦堡不断地就内容交换意见，在1532年4月帝国会议结束后，双方有了满意的结果，这才终于把教会条例定稿寄往维滕贝格请路德过目。^⑥

路德在信中表示收到了教会条例，在仔细阅读后认为“条例的核心不违背上帝的教导，也和我们的《萨克森巡视条例》意思一致。因此我们非常喜欢这份条例”。^⑦至此，改革运动已经不仅是一场思想变革，而且还是一场制度改革。当时教皇势力在德意志还极为强大，如果条例内容有任何偏差，不仅会影响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地区和纽伦堡，还会波及到整个德意志境内倾向新教的诸侯国和城市。

^①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XI*, 113.

^② “Die Nürnberger 23 Lehrartikel Verväichnus etlicher umbstende, darin die pfarherrn auf dem land examinirt und underricht mogen werden, ufs kuryist und nach ordnung begriffen,”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XI*, 128-134.

^③ Dieter J. Weiss, *Die Bistümer der Kirchenprovinz Mainz*, 127.

^④ “Die brandenburgisch-nürnbergische Kirchenordnung von 1528,”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XI*, 135-139.

^⑤ Gottfried Seebaß, “Stadt und Kirche in Nürnberg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in *Stadt und Kirche im 16. Jahrhundert*, ed. Bernd Moelle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8), 66-86.

^⑥ Georg Ludewig, *Die Politik Nürnbergs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n 1520-153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3), 138.

^⑦ WA Br. 6, 339, 341-342.

《1533年勃兰登堡和纽伦堡教会条例》分为序言、“论教义”、“论旧约和新约圣经”和“论基督徒的祷告”等21个小节。在弥撒和礼仪方面做出重大调整，规定会众可以在需要时用德语进行仪式：

如果是在学校举行的弥撒，学者们可以用拉丁语唱进堂咏（*introit*）。在人们无法用拉丁语咏唱的乡村，可以按照各地的习俗，改为唱德语圣诗。如果人们不会唱圣诗的话，教士应当予以指导。如果是在一些已经准备好德语进堂咏和其他德语圣诗的城市和乡村，则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动。^①

弥撒的其他部分也可以选择使用德语。在教士用拉丁语念完垂怜颂（*Kyrie Eleison*）之后，学者和其他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习俗，选择用拉丁语或德语跟唱。《条例》接着也指出，举行弥撒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会众都能够听懂和明白仪式的内容，以便虔诚地默想和祷告。^② 因此，按照个人的能力和喜好来选择语言，是德意志新教教会仪式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路德翻译的高地德文版《圣经》也在各地教会条例的革新中，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文本基础。^③

路德言论在公共空间里引发的巨大回响，是印刷时代的特殊产物。他的“私人信”在发展为“公共信”，继而影响新教城市政策的过程中，见证了自身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持续增加，伴随而来的则是其作品出版范围的不断扩大，说明路德与人民的互动和信息网络的扩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④

在宗教改革之前，路德的作品仅在维滕贝格出版过。到了15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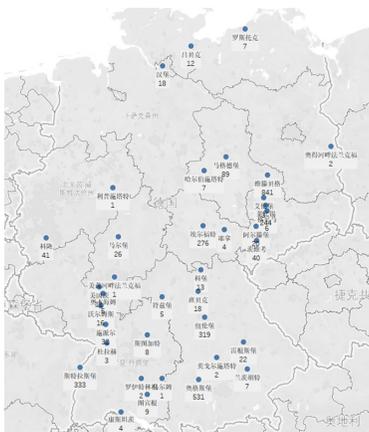
^① Markgrafschaft Brandenburg und Freie Reichsstadt Nürnberg in Zusammenarbeit, “Kirchenordnung in meiner gnedigen Herrn der Marggraven zu Brandenburg und eins erbern Rats der stat Nürnberg oberkeyt und gepieten,” 188.

^② Ibid.

^③ Sebastian Seyferth, “Frühneuzeitliche Summarien,” in *Languages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Textual Networks and the Spread of Ideas*, ed. Mikko Kauko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3-175.

^④ 1513-1533年间，路德作品在德意志城市的首次出版时间如下：1513年：维滕贝格；1517年：纽伦堡、莱比锡、兰茨胡特；1518年：奥格斯堡；1519年：埃尔福特、美因茨；1520年：慕尼黑、吕贝克、奥本海姆、科隆、哈尔伯施塔特；1521年：奥得河畔

纽伦堡、莱比锡和兰茨胡特开始出版他的作品，进入16世纪20年代之后，出版路德作品的城市数量开始快速增加，在这十年间，共有30个城市首次出版了路德的作品。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见图二），纽伦堡和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所在的德意志南部地区，集中了许多路德作品的主要出版地，包括纽伦堡、奥格斯堡、雷根斯堡、班贝克和斯图加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版地往往也会转变成为新教城市，譬如雷根斯堡从1542年开始准备颁布《教会条例》。^①随后，路德的作品越出了德意志南部地区进入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影响了



图二 路德作品在德意志的出版地及出版次数（1513-1533）^②

法兰克福、施派尔、沃尔姆斯、康斯坦茨；1522年：格里马、班贝克、汉堡、科堡、雷根斯堡、斯图加特；1523年：德累斯顿、茨维考；1524年：耶拿；1525年：马格德堡、艾伦堡、阿尔滕堡、图宾根、符兹堡、罗伊特林根、利普施塔特；1526年：罗斯托克；1527年：马尔堡、英戈尔施塔特；1529年：斯特拉斯堡、乌尔姆；1530年：杜拉赫；1533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www.ustc.ac.uk> (accessed April 20, 2022).

^① Freie Reichstadt Regensburg, “Wahrhaftiger Bericht eines Rats der Stadt Regensburg über die Einführung des evangelischen Abendmahls,”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XIII*, 389-394.

^② 出版地下方的数字为出版次数，譬如维滕贝格在1513至1533年间一共出版了841份路德的作品。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www.ustc.ac.uk> (accessed April 20, 2022).

吕贝克、汉堡和斯特拉斯堡等城市的信仰倾向。作品出版范围的持续扩大,说明路德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除了获得德意志重要城市对他的支持,路德的信息还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了德意志以外地区,譬如巴黎、巴塞尔、苏黎世和布雷斯拉等地。

在本文讨论的时间区间(1521至1533年)内,路德作品的出版数量占据了神圣罗马帝国“宗教类”出版市场的一大份额。在此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类”出版物共有8525份,排名前五位的作者为马丁·路德(31%)、伊拉斯谟(5.5%)、梅兰希通(3.6%)、布根哈根(3.2%)、乌尔班努斯·雷久斯(Urbanus Rhegius, 2%),除了伊拉斯谟,其他四位皆为支持新教的改革家。从出版地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城市为奥格斯堡(16%)、斯特拉斯堡(12.6%)、维滕贝格(12.4%)、纽伦堡(9%)和科隆(7%)。为了更好地与民众沟通,路德的“宗教类”作品中,多达百分之八十九的出版语言为德文,拉丁文为百分之十,其他语言还包括尼德兰语、法语和丹麦语。^①

由此可见,在印刷术的帮助下,路德的信息传递网络完成了从私人场域到公共场域的突破性转换:德意志民众的声音以书信和印刷物为载体迅速传播,无论是个人、城市还是地方诸侯,都可以对路德的观点展开讨论和分析,从而导致路德的言论能够超越地域局限,实现从个人意见到公共政策的转化,形成接受度极高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阐释,从而确保了新教政策的颁布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在16世纪中期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结 论

从神学争辩到社会运动的“转向”,是宗教改革运动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以往学者们都是从马丁·路德反对德皇和罗马教皇而

^① 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www.ustc.ac.uk> (accessed April 20, 2022).

迅速得到人民支持，来解释这场改革的基本性质。这样的解释固有其优点，但缺乏关于路德与民众交流互动的细节探究。缺少了这个环节，民众对路德的支持就被理解作为一种单向的自发行为。通过对1521-1533年间信息网络的考察，无论在运动的范围还是在发展的程度上，都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同时，路德关于社会改革的诸多观点，在获得新教城市和地区采纳后用于条例修订，也体现出改革的成效硕果累累。

16世纪德意志邮政系统的发展，使得民众参与改革成为可能，也让改革运动的“转向”化为现实。“转向”之前，路德是在于皇帝、诸侯、教廷代表和僧侣的教义讨论当中，坚持自己的新教立场和为信仰辩护；“转向”以后，路德是在民众的拥戴之下，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推进改革浪潮。这样一来，没收教会财产以建立符合民意的教会制度、婚姻制度和公益金制度等面向处理实际问题的改革措施，都被纳入到新教城市的教会条例之中，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德意志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种种顽疾。路德在1521年宗教改革低潮期之后发表的一系列公开信，说明他已经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改革必须建立在与群众沟通的基础上，解决德意志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够增进人民的福祉和推动社会的转变。关于民生问题的讨论，使得宗教改革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而得以持续发展，同时也把宗教改革转变成了触及到制度变革的一场社会革命。

综上所述，路德是以民众的舆论为面，以接纳新教的城市为点，以支持新教统治者的辖区为片，三者结合，相互作用，使得改革观点得以在新教行政区上升为法律条例。颁布新教教会条例，成为了城市和地区转换信仰的重要标志。此时大多数的教会条例都加入了兴办学校和普及教育的内容，新教教士会在学校里担任教师。据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约翰·维特（John Witte）教授统计，在新教城市官员的推动之下，新的教育体系建立起了数百个拉丁文学校、男子和女子俗语学校，为新教地区的学生们提供了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以

实现路德的“在每一个城镇都有学校”的理想。^①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信息网络的拓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掌握了知识的普通民众，可以自己阅读书本，也可以参与教义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新教改革家是有意识地在培育和构建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从而完成体察民意和落实改革的基本目标。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成果，不仅在于让人民获得了冲破传统牢笼的勇气，也在于为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① John Witte, *Law and Protestantism: The Legal Teachings of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8; Ernest G. Schwiebert, “The Reform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Church History* 17, no. 1 (1948): 29.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llen, E. John B. *Post and Courier Service in the Diplomacy of Early Modern Europ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2.
- Bauer, Oswald. *Zeitungen vor der Zeitung: Die Fuggerzeitungen (1568-1605) und das frühmoderne Nachrichtensystem*. Oldenbourg: Akademie Verlag, 2011.
- Brady, Jr, Thomas A.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randt, Walther I. "Introduction." In *Luther's Works, vol. 45*. Edited by Walther I. Brandt, 161-168.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2.
- Brecht, Martin. *Martin Luther: Ordnung und Abgrenzung der Reformation 1521-1532*.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GmbH, 1983.
- _____. *Martin Luther: Zweite Band Ordnung und Abgrenzung der Reformation, 1521-1532*.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86.
- Buckwalter, Stephen E. *Die Priesterehe in 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 Haus, 1998.
- Burnett, Amy Nelson. *Debating the Sacraments: Prints and Authority in the Early Re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Didczuneit, Veit. "Postgeschichte." In *Handbuch Brief: Von der Frühen Neuzeit bis zur Gegenwart*. Edited by Marie Isabel Matthews-Schlinzig et al, 163-186.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0.
-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Band I-XXIV*. Edited by Emil Sehling and Eike Wolgast. Leipzig: O.R. Reiland, 1902-2017.
- Dixon, C. Scott. *The Reformation and Rural Society: The Parishes of Brandenburg-Ansb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Greengrass, Mark.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C. Scott Dixon and Beat Kümin, 150-182. London: Routledge, 2019.
- Haustein, Jörg. *Philipp Melancthon: ein Wegbereiter für die Ökume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 Hennings, Thordis. *Einführung in das Mittelhochdeutsche*. Berlin: De Gruyter GmbH, 2012.
- Karlstadt, Andreas. *Die Wittenberger und Leisniger Kastenordnung, 1522, 1523*. Bonn: A. Marcus und E. Weber, 1907.

- Kaufmann, Thomas. *Der Anfang der Reformation: Studien zur Kontextualität der Theolog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2.
- Kleinoder-Strobel, Susanne. *Die Verfolgung von Zauberei und Hexerei in den fränkischen Markgrafentümern im 16. Jahrhunder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 Köhler, Hans-Joachim. Bibliographie der Flugschriften des 16. Jahrhunderts, Teil 1: Das frühe 16. Jahrhundert(1501-1530), Bd. 2, Druckbeschreibungen H-L. Tübingen: Bibliotheca Academica, 1996.
- Lindberg, Carter.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Social Welfare: Luther's Influence at Leisnig." *The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7(1987): 79-99.
- Ludewig, Georg. *Die Politik Nürnbergs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n 1520-153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3.
- Luther, Martin.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Böhlau, 1883-2009.
- Meyer, Wilhelm Heinrich. *Stettin in alter und neuer Zeit*. Stettin: F. Hessenland, 1887.
- Midura, Rachel. "Publishing the Baroque Post: the Postal Itinerary and the Mailbag Novel." In *The Renaissance of Letters: Knowledge and Community in Italy, 1300-1650*. Edited by Paula Findlen and Suzanne Sutherland, 255-271. London: Routledge, 2020.
- Möger, Melanie. *Reichstage und Reformation: Der Wormser Reichstag 1521*. München: Grin Verlag, 2010.
- Pettegree, Andrew. *The Invention of News: How the World Came to Know about Itself*.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Roper, Lyndal. *Martin Luther: Renegade and Prophet*.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6.
- Schwiebert, Ernest G. "The Reform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Church History* 17, no. 1 (1948): 3-31.
- Scribner, Robert W. "The Reform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Stadtbürgertum und Adel in der Reformation Studien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Edited by Wolfgang J. Mommsen, 49-19.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 Seebaß, Gottfried. "Stadt und Kirche in Nürnberg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In *Stadt und Kirche im 16. Jahrhundert*. Edited by Bernd Moeller, 66-86.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8.
- Seyferth, Sebastian. "Frühneuzeitliche Summarien." In *Languages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Textual Networks and the Spread of Ideas*. Edited by Mikko Kauko,

- 173-19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 Strauss, Gerald.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www.ustc.ac.uk> (accessed April 20, 2022).
- Vogler, Günter. *Nürnberg, 1524-152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tadt*.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2.
- von Mildenstein, Eduard. *Chronik der Stadt Leisnig: Handbuch d. Geschichte*. Leisnig: Bethke, 1857.
- Völker, Eberhard. *Die Reformation in Stettin*. Köln: Böhlau, 2003.
- Weiss, Dieter J. *Die Bistümer der Kirchenprovinz Mainz: Das exemte Bistum Bamberg 3: Die Bischofsreihe von 1522 bis 169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 Witte, John. *Law and Protestantism: The Legal Teachings of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